緊緊把握機遇率先突破 開創江蘇全面深化改革新境界

——江蘇觀感

高敬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創會會長 香港與內地投資商務促進會會長
鄒燦基 全國政協十一屆委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名譽會長
張 茵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

2014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作為改革前沿的江蘇省銳意改革，奮發向前，在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扎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均取得可喜成績。隨着改革進入「深水區」，面對的挑戰更趨複雜艱巨，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羅志軍意志堅定地表示：「我們將堅定不移地咬住發展目標，按照習總書記的要求，認眞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和這次全國兩會精神，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機遇，堅持穩中求進，把改革創新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努力使江蘇發展行穩致遠、健康持久。」江蘇省正在走出一條具有時代特徵、中國特色、江蘇特點的改革開放之路，保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全國前列。目前，江蘇全省經濟蒸蒸日上，社會和諧發展，形勢十分喜人。面對全國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發展，江蘇省非常有信心！

一、貫徹習總書記要求 江蘇改革成績可喜

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江蘇省代表團審議時，殷切希望江蘇「始終把已經取得的成績看作是事業新的起跑線，按照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要求，不斷開創工作新局面」，並對江蘇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扎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

過去一年，江蘇省把貫徹落實習總書記的要求作為工作的重點，扎實做好穩增長、調結構、抓創新、促改革、惠民生各項工作，經濟社會發展穩中有進、穩中向好。江蘇省2013年地區生產總值達5.9萬億元，增長9.6%，經濟保持穩定增長，公共財政預算收入達6,568.5億元，城鄉居民收入分別達到32,500元和13,550元，增長9.6%和11%。

去年，為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江蘇省大力實施工業強省「六大行動、十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推進方案，加快傳統產業向產業鏈高端攀升，江蘇省把轉型升級工程與科技創新工程結合起來，全社會研發投入超過1400億元，人才綜合競爭力和知識產權綜合發展指數位居全國前列；在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方面，江蘇省2013年實施了新一輪農村實事工程，區域供水通水鄉鎮、污水處理設施建制鎮覆蓋率分別達到83%、70%，新解決310萬農村人口飲水安全問題，行政村客運班車基本全覆蓋，鎮村公交開通率達到48%；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江蘇省提出率先建成全國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區，持之以恆地推進生態省和綠色江蘇建設，林木覆蓋率達到21.9%。

「如果不加大改革的力度，是不可能取得這個成績的。」羅志軍書記強調，江蘇省取得的成績，既是發展的結果，也是改革的結果。這些成績的取得與持續不斷推進改革密不可分。

二、咬定改革不放鬆 明確江蘇改革目標

在持續快速發展的進程中，江蘇省也面臨不少矛盾和問題，主要是產業結構不夠合理、資源環境加劇、自主創新能力不夠強、城鄉居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社會管理面臨諸多難題等。羅志軍書記直言，「江蘇省發展還有很多的困難和挑戰，需要我們堅定不移，咬定發展的目標。」羅志軍書記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法學碩士，自1995年起到江蘇省工作至今已19年，從出任南京市副市長開始，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開拓進取，一直走到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崗位，素以原則性強、作風扎實、謙虛謹慎、廉潔奉公、真抓實幹、不尚空談而著稱。羅志軍書記和精通科技、熟悉經濟、求真務實、生活樸素的李學勇省長對江蘇省情況了如指掌，對於下一步如何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突破改革過程中的「深水區」，江蘇省委、省政府運籌帷幄、胸有成竹。在羅志軍書記、李學勇省長和省委、省政府率領下，江蘇省正處在政通人和、社會和諧的大好局面。

今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代表國務院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貫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彰顯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為改革發展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根據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部署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江蘇省結合實際明確提出，按照中央「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積極推進在江蘇省的率先探索和創新實踐，走出一條具有時代特徵、中國特色、江蘇特點的改革開放之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羅志軍書記強調：「着力抓好中央改革決策的貫徹落實，保持中央改革決策的統一性、嚴肅性，確保中央改革部署在江蘇省不偏向、不走樣。」

三、打造江蘇特色改革品牌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在深化改革的同時，對實施新一輪對外開放作出了重大部署與佈局，提出建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等戰略。這為江蘇省提供了改革和開放的雙重機遇。

為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系，增強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江蘇省將重點圍繞企業國際化、城市國際化、人才國際化「三個國際化」，積極探索改革外商投資模式、外經貿體制、高層次人才引進方式，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

江蘇省一方面將努力學習借鑒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經驗，另一方面加大改革創新力度，支持各級各類開發園區、海關特殊監管區、出口加工區結合自身特點，在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為企業創造符合國際慣例的市場環境等方面先行先試、率先突破。羅志軍書記對江蘇與香港的合作十分重視，希望在江蘇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中與香港進行更深度合作，努力拓展蘇港兩地合作共贏新局面。

目前，江蘇省13個省轄市都明確了改革試點的平台和先行探索的任務。江蘇將抓住用好這些改革載體和平台，做大改革文章，疊加創新功能，形成更多制度性成果，打造具有江蘇特色的改革品牌。

羅志軍書記指出，2014年是江蘇省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為「關鍵一招」，推進全省生態文明規劃、建立長三角區域聯動機制、促進科技進步、保護知識產權。人們有理由相信，江蘇省將繼續以敢為人先的勇氣和覺悟，積極響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號召，不斷開拓創新，走在全國深化改革的最前列。

《蘋果日報》對交流恐慌說明什麼？

徐庶

香港的報紙社論，絕大部分都肯定上海之行打開了溝通的大門，今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將會繼續和反對派議員圍繞政改問題對話，希望縮小分歧，尋求共識，努力推動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以實現廣大香港市民普選特首的願望。

只有《蘋果日報》，對於雙方改善關係，在政改問題上繼續交流，感到惶恐不安。《蘋果日報》昨日更發表了名為「警惕京官政改騷再出陰招」的社論，攻擊參與交流的議員，說他們「為所謂的自由搏擊而喝采」，「不能不令人擔心」云云。《蘋果日報》居然要發動白色恐怖攻勢，煽動「傳媒要緊盯那些私會京官的議員們，不要讓他們一失足成千古恨」。這不過是下三濫的手段，企圖威脅反對派必須和最激進的社民連、人民力量、工黨捆綁起來，向激進反對派拒絕溝通的立場靠近，不允許他們繼續和中聯辦官員對話和交流。

究竟是誰對普選行政長官落下了鐵幕？一天到晚都攻擊提名委員會就是「篩選」？結果，中央官員澄清了激進反對派散佈的謊言，不是所有的「民主派」都會被排擠，一些理性對話的，願意做實事的，承認中國的主權的，尊重基本法的，都可以算是愛國愛港，千萬不要一竹篙打沉一船人。拆穿謠言，這對於激進反對派拒絕溝通的路線，當然是最有力的反擊。目前的現狀就是，反對派內部對於政改，都有不同的期盼，不同的訴求，希望有不同的進程。總的來說，都認同民主應逐步向前推進，而不是一步登天；作出彈性的處理，而不是一刀切，定於一尊，以利於不同的派別逐步形成共識，尋求最大的公約數。本來這是最民主的方法，既然上海之行中央官員已經與反對派議員見了面，為什麼《蘋果日報》卻要大力攻擊？

有人說，政、宗、媒合流，控制着激進反對派。現在的情況又有新發展，是黎智英的《蘋果日報》不允許立法會議員分批地繼續談論政改，害怕再談下去，就可能推動2017年的普選。《蘋果日報》演出了「媒控政」，「媒體扼普選」的鬧劇，讓港人看清楚了：《蘋果日報》不過是美國人的傳聲筒而已。

紫棋的不同評價孰是孰非？

楊志強
資深評論員

志強時評

香港新生代歌手鄧紫棋，正在變成一個具有號召力的流行文化當紅偶像，被兩岸三地熱烈地討論着。香港激進「本土派」勢力攻擊她為「賣港」、「港奸」，因為她在比賽中唱少了廣東歌。但是，香港「本土派」用粵語歌來作為「去中國化」和「文化港獨」的幌子，根本是捉錯用神。無論是普通話還是廣東話，都是中國話。鄧紫棋少唱粵語歌被罵「賣港」，是「港獨」思維的悖謬邏輯。

能進軍內地已是為港爭光

香港新生代歌手鄧紫棋（G.E.M）因為參加湖南衛視的《我是歌手2》節目，一夜之間大半個中國的人都認識她。她在香港奮鬥了六年，在內地寂寂無聞，但僅僅三個月時間，她個人和團隊的綜合實力，讓她的微博粉絲從一百五十萬秒速增加到超過一千萬。該節目4月初舉行總決賽，G.E.M最後雖然未能奪冠，但輸了給韓磊這位足以當她父親的前輩歌手，她表示輸得心服口服。撇開天時地利人和，G.E.M入到三甲更名列亞席，亦無愧無憾矣。鄧紫棋的香港粉絲並未因比賽結果失望，更大讚偶像表現好，認為「能進軍內地已是為港爭光」。

《我是歌手2》首期播出時，「不認識，但感覺不錯」是大多數內地觀眾對鄧紫棋當晚表現的評價，評論和轉發量也瞬間高達3萬，粉絲數目也從播出前的156萬增至180萬。節目播出兩期後，她成功位列百度風雲榜女歌手、美女兩個榜第一名，還獲得汪峰、那英、譚詠麟等多位樂壇宿將力讚。鄧紫棋自己都被驚到了：「真的嚇壞了，《我是歌手》好厲害。」她成了最大的贏家。

但是在香港，所謂「本土派」人士對鄧紫棋的評價卻南轅北轍。他們認為，鄧紫棋竟敢走進中國內地闖天下，無論有多少成就，都是「媚共」。鄧紫棋在內地愈受歡迎，香港激進「本土派」攻擊她的聲音便愈難聽。香港有一些激進輿論認為「她的香港符號在崩塌」，高登論壇上的一些網民對她冷嘲熱諷，用「北上撈金」和「向內地獻媚」形容她。「港獨」勢力更毒罵她為「賣港」、「港奸」，因為她在比賽中唱少了廣東歌，也因她曾經撰文為特首梁振英打氣。

上月底，鄧紫棋在Facebook公告得了人生第一個國際獎項，又因為一句「作為第一個代表中國入圍這個獎的香港歌手，能得獎真的很榮幸！」網上有文章攻擊鄧紫棋「出賣香港」、「背離成長及發跡地的藝人」、「成為輿論機器的傀儡」，「企圖矮化香港成中國普通城市」。

《亞洲週刊》近日「鄧紫棋衝破『港獨』毒罵揚威中國」的專題報道認為，內地與香港之間，不可否認無論是文化還是制度都有很多差異。近年來，香港民粹情緒氾濫，鄧紫棋的內地之行也意味着她進入一個輿論雷區，「但其後發生的事情證明，她去對了」。

對於鄧紫棋被罵為「港奸」，香港文化人梁文道近日撰文挺鄧指出：「今天的本土意識走到極端處，常常會跑出一些奇怪的邏輯。例如一個香港人在大陸走紅，那就叫做對不起香港了。」梁文道又以反諷語氣指出：「秉持這套邏輯，我們還可以寫一部『演藝界港奸小史』。開頭第一章一定是葉麗儀，誰叫她那首《上海灘》唱遍大江南北。接下來還有譚詠麟、張國榮、梅艷芳、張學友、黃耀明，以及演員中的張曼玉、梁朝偉以及周星馳……香港演藝圈真是奸人輩出，賣港無窮。鄧紫棋只不過又一生力軍罷了。」

春晚為許多香港藝人打開內地市場

■楊志強

八十年代，香港電視劇《霍元甲》、《上海灘》等相繼在內地熱播，主題歌亦隨即火遍大江南北。香港女作家林燕妮撰文形容《上海灘》在內地播放時的狂熱，形象地說「《上海灘》一播，整個上海癱掉了」。春晚則捧紅了明星無數，也有許多的香港藝人通過春晚打開了內地市場。1984年張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國心》一炮而紅，此後，羅文、汪明荃、徐小鳳、甄妮、譚詠麟、潘美辰、鄺美雲、梅艷芳、劉德華、郭富城、張栢芝、林憶蓮、阿杜、莫文蔚、容祖兒、蔡依林、陳奕迅、謝霆鋒……等等都曾是春晚的座上賓。例如1989年，徐小鳳在春晚上唱紅了《明月千里寄相思》和《心戀》兩首歌，並以一裳華服驚艷了國人。1991年的春晚香港藝人的分量很重，甄妮、譚詠麟、潘美辰、鄺美雲等都是當年的當紅歌手，《魯冰花》、《水中花》、《我想有個家》等歌曲傳唱至今。

吸引幾代香港當紅歌手進軍大陸的，當然不是春晚的演出報酬，而是這個舞台對推動大陸市場帶來的機遇。隨着內地和香港兩地社會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香港藝人通過參加內地的節目被內地觀衆了解熟知。

近些年來，受到互聯網影響和數字化媒體帶來的盜版衝擊，唱片業普遍不景氣，1990年代港台流行音樂一派繁榮的景象估計已經是絕唱了。如今，聽眾不再買唱片，而是選擇從網絡收聽或下載歌曲。唱片業萎靡的直接影響就是歌手群體的萎縮。另一方面，大眾對高品質音樂的渴望其實並沒有消失，這種渴望的集中爆發點就是近年來出現的幾檔異常火爆的歌唱類真人秀比賽。其中的代表就是浙江衛視的《中國好聲音》、湖南衛視的《我是歌手》以及今年央視的《中國好歌曲》。這幾個節目的共同特點是，忠於音樂、製作精良，不惜大手筆投入，力圖挖掘真正優秀的歌手，使音樂回歸本質。

用粵語歌作為「港獨」幌子捉錯用神

近年來，香港興起了所謂「本土派」，祭出了「抗拒赤化」、「拒絕內地化」的旗號，聲稱普通話歌是「大陸歌」和「共匪歌」，表面上是追求港人的本土利益，骨子裡只是在「抗中」和推行「文化港獨」而已。實際上，粵語歌並不能被「本土派」用來作為「去中國化」和「文化港獨」的幌子。與普通話歌有4個聲調不同，粵語有8個聲調，其實來自於中國古音的8個聲調。宋詞就是當時的流行歌曲，香港的許多粵語歌透露出宋詞韻味，加上粵語的8個聲調，儼然就是當代的宋詞流行歌曲，這是中華文化最正宗的衍流，「本土派」用粵語歌來作為「去中國化」和「文化港獨」的幌子，根本是捉錯用神。

對於鄧紫棋來說，唱歌時不同語言的使用，她認為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廣東話和國語都是我熟悉的語言。廣東話很硬朗，有節奏感的歌，廣東話表達比較好。但我寫抒情歌，則要寫英文要寫國語。比較淒美的情緒，廣東話唱出來，好像沒有那麼貼切。」其實，無論是普通話還是廣東話，都是中國話。鄧紫棋少唱粵語歌被罵「賣港」，這是「港獨」思維的悖謬邏輯。鄧紫棋內地爆紅不僅說明「文化港獨」行不通，也說明文化磨合需要的是理性探討、族群團結，需要的是真誠包容。

一場自導自演的鬧劇

高天問

這一次上海之行，社民連和工黨上演「有交流無溝通」的鬧劇，說明他們以參加「上海之行」為名，實際上是想綁架其他反對派議員，脅迫他們也要向工黨看齊，集體中途離開上海，使上海的對話無疾而終。結果，他們騎劫「上海之行」的計劃徹底失敗了，成為政治小丑。

香港七百萬人看到的是，大多數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留了下來，和中央官員進行了很好的對話，大家起碼開誠布公地談了自己對政改的期望，即使分歧沒有化解，但是改善了關係，增加了解，建立了今後繼續對話的機制，有利於逐步拉近距離。無論如何，這都是為推動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作出了努力。

香港社會公眾心明眼亮，看得出什麼人從開始就言行不一，欺騙公眾，說要參加上海的對談，「為爭取落實普選而努力」，原來是虛晃一槍，到了上海，就蓄意製造事端，變成了抗拒交流的政治秀。

上海之行還未有成行，何秀蘭就向中央政府出了許多難題，「要單獨會見中央官員」，「不希望建制派參加」，彷彿他們高人一等，可以製造貶低建制派的安排。他們以為難題一出，就可以獲得一個借口，既不參加上海交流，也把責任推給中央政府，可以取得阿Q式的宣傳勝利。但是，中央政府棋高一着，先來一個集體開會，到了半場，建制派有另外的活動先行離開，由中央官員和反對派議員繼續討論政改。既然何秀蘭如此重視要和中央官員就政改問題對話，為什麼前言不對後語，沒有見到中央官員，就先行返港呢？這分明是要製造「有出發，無交流」的局面。當初他們要求單獨會晤中央官員的表態，都是假情假意。

梁國雄、何秀蘭之流，根本就沒有誠意和中央討論政改。梁國雄一早就準備了道具做大騷，這些違反內地法律的宣傳品，當然不可能經過海關進入內地。製造反共題目才是社民連和工黨派人到上海的真正目的。選民委託他們到上海交流，是為了推動行政長官普選，他們卻陽奉陰違。何秀蘭居然還要把離團的責任推給中央政府，更是混淆視聽、欺騙市民。工黨渲染所謂「對抗氣氛」，目的就是要扼殺中央官員和反對派交流的氣氛，擴大矛盾。

工黨上演的鬧劇，暴露激進反對派根本不想和中央官員溝通，而要拉倒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要搞「佔領中環」。所以，他們不會支持溫和反對派繼續交流溝通。他們要主導政改，迫使溫和派追隨他們的杯葛行動。但是，民意再次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大家都支持繼續交流，使激進反對派變得空前孤立。有分析指出，這一次反對派陷入了最大的被動，他們反對交流，反對解決分歧，反而失去了民心。

大家都看到，破壞溝通交流的，正是玩弄陰謀詭計的社民連和工黨。